

媒介与学生：

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学生杂志》

(1914—1931)

MEIJIE YU XUESHENG
SIXIANG WENHUA YU SHEHUI BIANQIAN ZHONG
DE XUESHENG ZAZHI

刘宗灵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电子科技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项目编号：ZYGX2015J172）的资助！

媒介与学生：

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学生杂志》

（1914—1931）

MEIJIE YU XUESHENG
SIXIANG WENHUA YU SHEHUI BIANQIAN ZHONG
DE XUESHENG ZAZHI

刘宗灵 著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曾 鑫
责任校对:李金兰
封面设计:墨创文化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与学生: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学生杂志》:1914—1931 / 刘宗灵著.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690-1223-1

I. ①媒… II. ①刘… III. ①期刊—文化史—研究—中国—1914—1931②青年—研究—中国—1914—1931
IV. ①G239.296②D693.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46094 号

书名 媒介与学生:思想、文化与社会变迁中的《学生杂志》(1914—1931)

著 者	刘宗灵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223-1
印 刷	四川盛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875
字 数	292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序 言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报刊媒介的出现，还是学生群体的兴起，都无疑是改变社会、思想与文化版图的重要现象。20世纪的前3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缓慢，从现代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读书人中，占主流的还是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他们无论是在学期间，还是初入社会，都渴望能有一种彼此联络、互通声息的媒介。民国前期，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学生杂志》，对这些中等学力的知识青年来说，在知识上能给以辅助，于情感上能有所慰藉，于社会网络上能有所构建，因而得到了许多普通学生与一般知识青年的喜爱。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当时面向社会大众发行的该杂志，已成为一般普通学生私人生活中的一部分，既为他们拓展了生活空间，在全国舞台上为他们建立起了互相交流与联系的渠道，又成为他们身份表达与自我认同形成的途径。与此同时，《学生杂志》还是他们获取新的知识与思想资源的媒介。故此，该期刊融合了学生与媒介两个关键要素，并且涉及到知识、思想的生产与传播等问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近代的读书人与传播媒介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之所以选取这个视角，正是希望从立足于报刊的社会文化史的维度，来透视近代学生的社会地位、群体形象、集体意识的呈现与变化，同时关注于各类学科知识传播与接受的状况，以尝试突破过去学界流行的以精英知识分

子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以为加深对近代社会变迁中读书人社群的理解提供另一种可能。

最后，本书是由笔者博士论文修缮而来，因当年的学力眼界所限，文中难免诸多浅陋错谬之处，故仅作抛砖引玉之用，还望学界同仁多给予批评指正才是！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为学生? 谈学生?	
——《学生杂志》十八年简史	(27)
第一节 创刊缘起及意义	(28)
第二节 编辑宗旨及其演变	(34)
第三节 编辑者及其前后变化	(50)
第四节 作者群与读者群	(55)
第二章 学与读: 新学生的学习方式与现代学科知识的传播	
	(78)
第一节 课堂之外: 报刊与近代学生学习方式之变迁	
	(81)
第二节 国文教育变迁之载体与新文学的“传播网络”	
	(91)
第三节 “赛先生”东来: 科学新知的传播与接受空间	
	(103)
第四节 “社会科学”知识与话语的登场及流变	(122)

第三章 参与之道：政治、社会与学生之间的对应关系	(142)
第一节 清末民初政治之变局与“学生社会”的兴起	(143)
第二节 对学生参与政治方式规划的前后转变	(149)
第三节 从个人到社会：学生身份建构与责任践履之途径的演变	(182)
第四章 公共论坛的构建：对学生切身问题的讨论	(197)
第一节 烦闷的学生——五四以后青年学生切身问题的浮现	(201)
第二节 恋爱、婚姻问题	(206)
第三节 升学、自学与苦学	(234)
第四节 职业问题	(247)
第五章 阅读与生活：传播媒介与学生生活营造	(267)
第一节 从资深作者到实际主编：杨贤江与《学生杂志》的因缘	(268)
第二节 初试啼声、应付困境与思想媒介：报纸杂志与普通学生的生活营造	(284)
第三节 “通讯”栏与知识青年的生活图像及群体认同	(304)
结 语 媒介与学生	
——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另一个侧面	(326)
后 记	(340)

绪 论

一、问题缘起与选题意义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报刊媒介的出现，或是学生群体的兴起，都无疑是改变社会、思想与文化版图的重要现象。从晚清开始，士人的生活与报刊就逐渐发生了联系，他们通过阅读报刊了解世界，接受新知，形成了新的知识观、人生观，乃至生活方式。^①进入民国以后，随着传播媒介的进一步发展，承载着信息、思想、知识的报刊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一般读书人的生活世界中。^②更重要的是，往往依靠报刊联系起来的读书人会自成一

① 清末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就将学校、报纸、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并将报刊拔高到国家竞存的地步，“二十世纪以前，枪炮之世界也；二十世纪以后，报馆之世界也”，他还感叹斯时的状况是“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参见梁启超：《论报馆之有益于国》（1905年）、《敬告我同业诸君》（1902年），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卷1，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66、969页。研究者也指出中国的思想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代表性标志之一就是报刊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以此促成了近代公共舆论的展开。张灏：《近代思想史上的转型时代》，《张灏自选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年，第110页。

② 参阅章清：《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1—25页。这当然不是说一般文化程度较低的市井小民就不与新式传播媒体发生任何关系了，清末各式白话报的兴起，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启蒙下层人民，改变他们与社会不发生关系的现象。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64页。

个社群，互相之间产生认同感，乃至形成一种以归宿感为导向的集体意识。^①而作为近代知识分子中的一个新兴群类，学生（主要指中等学校以上）与报刊媒介之间的关系，更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随着新式教育的确立与发展，这个群体的数量日益增加，对社会的影响也逐渐扩大。

（一）问题缘起与研究对象界定

学生之所以在近代成为一个集众人关注于一身的群体，这自然与他们代表了新知与未来，无论是在自身的想象中，还是在他人的期待里，都成为拯救国族的重要甚至惟一的力量有关。自晚清以来，中国在与东西列强的冲突中屡屡受挫于外人，一次次的丧权辱国导致士人精英们对象征屈辱与失败的过去感到极度失望。因此，他们在对成年人进行鞭挞的同时，也在呼唤一种新的历史主体，以图拯救国家民族。而具有生理年龄与知识构成双重优势的学生自然被推上时代的最前沿。清末即曾有人在当时第一本以“省份”与“学生”这两个充满象征意义的符号命名的留日学生刊物——《湖北学生界》上进行救国鼓吹时，既立足于省界进行广泛动员，也将学生的特殊地位加倍放大并突出。“学生生于二十世纪之竞争中心点——中国者，胡为乎？将曰：鼓铸国民之资格，生存黄帝之子孙，以与搏搏大地之强族争雄长权也。”为了铲除国民不相团结一盘散沙的毛病，必须以学生为基础进行社会的重新组织，“以团结四百兆同胞以成一大团体为目的，以团结各学堂学生成一小团体为起点。公益所在，不惜毁碎单数之私益，以拥护调剂之，将来学生势力之膨胀，必将以吾鄂中学生为中心点矣。”作者还借用西哲的“社会者，一小国家也”之语，将其改为“学生者，真小国家也”，因此，学生在民族振兴与国

^①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第308—309页。

家重建过程中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盖学生如造国家之机器，无学生则国家不能成立。诸君亦何幸而负学生之名望也。诸君诸君，可以豪矣！”^① 在传统社会里，由于老年是经验与智慧的代表，因此无论是在学问上还是社会地位上，青年人都处于向老年人学习的地位，并最终通过伦理等级秩序将这一差序结构固化下来。但随着近代知识范式转型的开始与新式教育制度的确立，具有年龄优势与素质可塑性的青年学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他们在知识、能力、道德上都具有超出成人的可能性。一方面是民族建国过程中内外环境的艰难急迫，一方面是代表超越与拯救可能性的学生群体日益受到重视。

当时正流亡日本的舆论健将梁启超也在积极地进行类似的民族主体的呼唤。在那个中国正处于危机与生机并存的过渡时代里，他将全国人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其一老朽者流，死守故垒，为过渡至大敌，然被有形无形之逼迫，而不得不涕泣以就过渡之途者；其二青年者流，大张旗鼓，为过渡至先锋”。^② 要救国必须先接受新知，那当然不是四书五经代表的传统规范性知识——那是象征过去的成年人们的专利；而能接受且传输来自西洋的现代性新知以救国的群体，则惟有青年学生。知识范式与来源的变化也大幅提升了青年人的社会地位。因此，在从外洋输入知识几成近代中国自我救赎唯一选择的情形下，有论者积极劝告青年们游学外洋，“而自今日观之，中国之种祸固如何巨如何急乎？且中国有何种学问适用于目前，而能救我四万万同胞急切之大祸也？某今

^① 《敬告同乡学生》，《湖北学生界》第5期（1903年），收入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第六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出版，1968年，第1—15页。

^②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2册（1901年），收于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78年，第5—6页。

又决言曰：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之唯一方针。”^①此外，学生本身对于自己所具使命之意义的想象与担当，也是愈来愈明显。不仅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初实际参与了国内的政治活动，留美学生们也希望通过学术参与社会，力图为困窘中的国家开一新局面的期望也很强烈。此时尚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任鸿隽就在批评传统中国学界缺失以致国弱民愚的弊端后，表示当今创建学界的责任端在留学生，“科举时代无论矣，自改设学校以来，教育未兴，学制未善，国内尚无名实相副之大学。必不得已，求为吾国未来学界之代表者，其唯今之留学生乎。”社会组织不完善，致使读书人用非所学，“改造而振作之，正唯吾留学生之责”。^②

可以说，这种主体想象贯穿于近代中国的整个历程。“少年”“青年”“学生”等不论是作为实体还是符号，都成为怀抱革新社会、振兴国家志愿之时人反复言说的对象。^③五四以后，在全国的知识青年中更是出现了不少以“少年”“青年”等命名的社团与期刊。^④直到1930年代，仍然有人从时代客观环境与青年学

① 《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期（1903年4月），见张枏、王忍之前揭书，第一卷（上册），第381页。

② 任鸿隽：《建立学界论》，原载《留美学生季报》第2号（1914年6月），收于樊洪业等编：《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7—8页。

③ 如民初报人黄远生等于1912年创办的一份以批评时政为宗旨的政论周刊，亦是以“少年中国”为名。其目的在去除“所谓稳健云云者之意识”，以出于良心之言论，“一新政治或社会之空气”。《〈少年中国〉之自白》（《少年中国》周刊第4期，1912年12月12日），收于黄远庸：《远生遗著》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第8—15页。此处黄氏等人正是要以“少年”象征之精神打破“成人”代表的因循守旧的社会习气。

④ 其中最著名的自是1919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此外还有些中等学生所成立的社团与出版的刊物亦以此命名，如河南省立二中学生曹靖华、蒋光赤等人成立的“青年学会”，北京高师附中夏康农、赵世炎等人成立的“少年学会”等，目标都是发展个性、研究学问、批评社会等，以“养成健全少年”或“养成青年的真精神”。参阅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三），三联书店，1979年，第69—110页。

生的主观特性出发进行针对性动员,“现时代的青年学生,在客观环境方面,摆脱不了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之不幸命运,同时,在主观的心理方面,一则具有较人纯洁和清晰的思想,一则具有较人充盈和热烈的感情。”消极的外部环境恰是青年奋起承担责任的起点,“学生在思想上,对旧时代的罪恶,有了纯洁而清晰的认识;在感情上,对破坏和创造的事业,有了强旺而热烈的冲动:这在主观方面,便具有了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在社会上,学生遭受了种种问题的围困和压迫,更无异在客观方面说明了他自身的革命的必要性”。^①作者此处所指的革命未必是暴力性的,但是对于学生独具特质的挖掘却是与前一脉相承的。

总而言之,这一切都可归结为一种“少年崇拜”。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将这种期望表达得淋漓尽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②这种论述一经形成就一直延续下去,成为清末、民国甚至今日的一种流行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从内外两个视角出发的主体想象论述多是通过报刊媒介表达出来的。在阅报越来越成为时尚风气的情形下,报刊媒介上的文字,其效力也远大于其他传统的传播媒介。因此考察报刊媒介和这种国族主体想象与塑造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件可能且有意义的工作。除了这些自我表达的言论以外,新式传播媒介还是各类学科知识资源的载体,近代教育体制内的学生们除了课堂学习外,阅读报刊也是接受旧学新知的重要渠道。

^① 陈以德:《现代学生的责任》,《现代学生》1卷3期,1930年12月,第4—5页(文页)。

^②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

除此之外，在近代化的曲折过程中，学生本身所遭遇的问题也颇值得关注。他们不仅是一个承载希望的群体，也是一个充满问题的群类。尤其是当他们自我意识逐步萌生，对社会环境不满加剧，力图改变自身命运的时候，他们与社会的冲突就会呈现出来。而外部环境的大变动往往会加剧这种学生生活“问题化”的趋势，如思潮激荡的五四时代即是如此。因此，考察这些问题在媒介中的呈现以及时人对它们的筹划解决之道，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那个时代的某些特质。

通过进一步的史实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时代发展，新式报刊愈来愈深入地影响到了学生群体的生活轨迹，与他们形成了密切的关联互动。针对学生群体的报刊媒介，既在课堂之外为学生们提供了接受新型知识、思想资源的渠道，还有他们互相联系、自我表达的公共领域，以及塑造人生与自我实现的途径。我们也可以借此了解作为报刊读者群的他们，如何利用这类符号资源营造自身生活，如何借此想象自身、进行自我身份塑造，如何表达情感认同，如何由此形成群体感与身份意识，以及时人与学生自身对这个代表希望的群体如何去参与政治、社会，如何投身于救国建国的宏大工程的规划，都是可以认真探讨的问题。

当然，限于资料与学力，本书无法穷尽所有资料来探讨这一问题，也无法把目光聚焦于近代中国的整个历史时段，而只能借由一些可能的线索与渠道来梳理上述问题。为了使叙述显得更为集中，也鉴于材料的搜求状况，本书主要借助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学生杂志》（1914.7—1931.12）这样一份持续时间甚长，且鲜明地以在校学生为受众的期刊，再辅助以其他相关资料，来探讨学生与媒介的关系。而笔者所要探讨的这种关系，主要目的并不是关注于他们的实际抉择，而是意图从媒体这个外部视角去考察社会对他们的角色赋予，以及他们自己的角色期待与责任担当。因为，在报刊这个论域空间中，青年论述与学生论述交织在

一起，充分体现了社会各界——包括学生自身，对学生群体的想象与模塑。这种对新的历史主体的呼唤与打造，本身也包含有鲜明的代际意味在里面。^① 因其新知载体的地位与德性方面的纯洁性与可塑性，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家之希望所在。在此一空间中，还传播着不断更新的知识样式，呈现出知识谱系的多元化景象，甚至不同属性知识间的竞争角力也在其中表现无遗。此外，知识传播的变化、切身问题的讨论、学习方式的改变等，都是本书试图考察的对象。

如果要更加清晰地表达笔者的意图，则可以这么说：本书是力图借用一份以学生为发言对象的期刊，来反映时代情景的变迁，包括政治、社会、思想、知识等各方面因素在民国前期近二十年时段内所经历的嬗变，可以说是立足于报刊传媒史的社会思想文化研究。

（二）《学生杂志》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学生杂志》这份期刊虽然在近代以来勃兴的杂志潮中，不那么起眼，在新文化运动浪潮中一度受到冲击乃至被边缘化，甚或在后人的历史记忆中也被多抹去，但这并不说明该刊物就没有

^① 目前历史学界对近代中国代际关系的特征与嬗变已有一定的研究成果，其中较有启发意义的论著有以下一些：章清：《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代际意识”的萌生及其意义》，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编：《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一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149页；焦润明：《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史学集刊》2003年第5期，第40—45页；耿传明：《在“新”“旧”对峙的背后——从林纾看“五四人”与“晚清人”的代际文化心态差异》，《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41—47页；金燕：《“少年中国”形象的建构与中国认同危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近代中国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3—86页；王鑫磊：《近代中国社会代际关系的历史考察——以五四时期知识分子的代际冲突为中心》，复旦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未刊稿，等等。虽然笔者的研究主旨不是对近代知识分子的代际关系进行考察，但上述这些研究成果为我们呈现了近代知识转型之下读书人内部的代际建构，对本书亦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相应的历史价值，或没有研究的意义。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等刊物屡被研究者提及，成为研究热门的情况下，考察这份历时甚长却成为世人记忆盲点的刊物，或许也能说明知识文化传播与时代思潮嬗变的一般形态。相对于后来广受研究者关注的精英型新文化刊物，具中等知识程度及其以下的青少年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最普遍接受的知识思想形态，或许更能从这个稍显平凡的视角中体现出来。除此之外，历时长久、信息容量丰富、流通范围广阔，是该杂志的特点。若结合时代背景与有效的观察视角对其进行细致梳理，将会加深我们对特定历史语境的认知。笔者认为，将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挖掘，至少具有以下若干方面的意义。

第一，教育史、学科史方面的意义。《学生杂志》作为民国时期持续时间最久的一份学生期刊，向全国的普通学生们传播普及了丰富的各类旧学新知，满足他们的求知欲，并帮助学生深化学习内容，以补充课堂教学之不足。近代教育兴办之初，各地师资力量参差不齐，教职员水平不足者比比皆是，地域差距也相当大。许多学生在学校里通过单纯的课堂学习满足不了旺盛的求知欲，于是转向课外教辅读物。^①商务印书馆作为中国近代出版界最大的一家教育书刊生产中心，为学生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学校教科书、参考书、工具书等知识产品。但除了这些一次性出版物以外，学生还需要能够为他们及时解疑答难的媒介，作为定期出版物的《学生杂志》的出现，无疑是满足了他们这方面的要求。通过这个渠道，知识传播不再是单方面的，而是形成多向流通的轨道。学生们不仅可以就自己学习上的疑问向编者请教，以便及时

^① 云六：《现行师范学制的流弊及其改革法》，《教育杂志》12卷9号，1920年9月，第1—9页。不少学生在回忆中也提到这一点，如艾芜就回忆了1920年前后再家乡学堂念书时热衷于读报刊的情形。艾芜：“我的幼年时代”，《艾芜文集》卷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5—142页。

获得解答，还可以将他们在自己学校课堂上所学得的知识发表出来，与他人共享。从中我们可以得到民初学校里中等学生所学习的知识内容与接受程度方面的信息，从接受者而不是传播者这个角度进一步丰富我们对近代教育史与学科史的理解。

当然，商务出版这份期刊的目的除了为学生群体服务以外，利用它加强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以为自家的文化产品做广告，也是目的之一。而这其实也正体现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家出版商兼具服务性与商业性的特点。从1910—1930年，除去各地学校与学生组织出版的校报会刊之类的读物，明确标举“学生”名号，以全国范围内的普通学生为服务对象（以中等学生为主），由商业出版社编辑发行的另外一份学生刊物则要等到1930年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的问世了，接下来便是1930年10月由大东书局创刊的《现代学生》，1931年1月由光华书局创刊的《新学生》等。而此时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出版已经十多年了，与过去几代的全国学生群体间已建立起了密切的互动与联系。^①因此，要了解民初这段时间内的学生与教育相关问题，《学生杂志》是一个绕不开的对象。

第二，社会史、政治史方面的意义。在民国前期这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社会、政治变迁极其剧烈，这些变化从刊物中也会反映出来。《学生杂志》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经历着纷乱剧变的时代中青年学生思想动态与行为方式的窗口。不论是学生自己，还是社会人士，都在这个空间中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思想资源。透过这些资源，我们可以了解这十几年来学生思想动态与行

^① 五四前后出现于各地的学生自办期刊，在其后几年逐渐分化瓦解。学生读者群也有所分化，有的转向具有左翼政治色彩的青年刊物，如《先驱》《中国青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中国学生》（中国学生联合会创办）等，但是这些色彩过于鲜明的刊物无疑只会吸引一部分倾向激进的青年学生，大多数以求学为目的、政治态度温和的学生读者，又回到《学生杂志》这样的启蒙色彩更浓的刊物上来。

为方式的变迁。编辑在借助这一平台进行自我的理念宣传和社会动员，学生们对社会现实的理解与认同也通过这个窗口呈现。这个言论场域在呈现编者思想倾向的同时，也将学生读者乃至于时代的一些思想风貌体现出来。在时代大变动发生以前，学生的个人切身问题没有浮上水面，在学生所作的课艺习作或论说文章中，修德进业的话语被一遍遍重复，除了屡被强调的外部国家危机外，看不出其自身群体蕴藏的危机。随后“五四时代”的一个副产品，就是将一切都“问题化”，催生了一代“烦闷”的学生，求学、婚姻、职业等学生切身问题的发生与应对都烙上了时代的印记。社会与政治也在呼吁新的参与方式。各种知识类型的传播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比如随着现代化步伐的深入，科学知识传播的重心在不断加深；因应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杂志所刊登的文艺作品类型发生了变化；随着社会政治语境的改变，不同种类的“社会科学”知识话语也陆续登场。到了20年代后期，随着国民政府的建立与训政建国的开展，学生这种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的力量也被论者力图融入整个民族国家建设的过程中。主义的选择和政治的立场都已不是问题，学生只需在稳定的公共秩序下将自己锻造成良好的国民。这种种趋势都反映了时代的变化，而时代的变化能够在报刊的言论空间构成上明确地体现出来。

第三，报刊史与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意义。近年来，大众报刊作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之意义屡被学者提及。具体报刊与思想文化版图构成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中国港台地区及海外论著，如潘光哲教授近年来对《时务报》的关注，^①季家珍对《时报》与晚清趋新士绅及改良

① 潘光哲：《时务报和它的读者》，《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第60—83页；《开创“世界知识”的公共空间：以〈时务报〉的译稿为例》，《史林》2006年第5期，第1—18页。